

主題 | 「沒有歷史的人」論壇－亡故於南洋的台籍日本兵之家屬

時間 | 2019 年 11 月 1 日(週五)09:30-16:50

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修齊講堂

主持人 | 汪宏倫

與談人 | 藍適齊、陳柏棕

主辦單位 |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合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

汪宏倫：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大家好，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參加這個非常有意義的座談會。我們這一場跟上面那一場比起來，是一個比較嚴肅、沈重的議題，是跟戰爭有關，謝教授為這場所訂的題目叫做：「亡故於南洋的台籍日本兵之家屬」。事實上，我們知道戰爭對於台灣的社會其實是有非常深遠的影響，但是我們對於戰爭的重視或者相關議題的討論，顯得相對稀少。我先前曾經編過一本書叫做《戰爭與社會》，我想這也是我被邀請來主持這場座談的原因之一，在書裡面我曾經提出一個命題。一般談到戰爭的時候，都很喜歡引用寫戰爭論很有名的普魯士的作者叫克勞塞維茲，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戰爭是政治以及其他手段的延續。」但是我對台灣社會的研究，甚至對東亞、對當代的研究，我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命題：「當代的社會其實是戰爭以其他手段的延續」。這提供大家一個比較大的思考方向，我們今天在台灣，要怎麼樣去理解、思考戰爭所遺留下來，不同方面的問題。

我們今天這場主要的焦點就是在，我們正統的戰爭論述或歷史國族論述之外，經常被遺忘、或者被排除的一群人，也就是那些已經身故，在戰場上犧牲了他們的性命這些台籍日本兵。他們的歷史或是故事，在我們正統的教育、歷史當中是被排除在外的。今天邀請到兩位發表人，一位是政大歷史系藍適齊老師，他先前已經做過很多關於台籍戰犯、台籍日本兵的研究，我自己個人也是受到非常多的啟發，我先前編的那本《戰爭與社會》也邀請藍適齊教授，來討論台籍戰犯的一些相關的研究。他今天主要報告的題目是「臺灣的二戰戰歿者與遺族的記憶」，我們就先以掌聲歡迎他。

藍適齊：首先要感謝成大還有謝仕淵老師，很高興來這邊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研究的心得或是觀察。我剛剛聽到前一場的發表，談到紅葉少棒還有這些球員在人生當中，曾經有一段一直被大家記得的歷史，還有一大段被大家忘記、甚至連他們自己可能都不想去回憶的歷史。這個跟當時的國家體制，剛才吳副校長也提到的，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群，跟國家體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的生命其實是在國家體制影響之下受到了重大的衝擊，包括他們家人的生命，可是接

下來的國家體制對他們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對待。也因為這樣，我今天想從台籍日本兵特別是台籍日本兵當中的戰歿者，還有他們的遺族怎樣去追憶他們。我想從這個角度去回答一個大的問題，大家可能會很好奇說，今天為什麼還要談戰爭，這場戰爭沒有離我們很遠，可是如同汪老師所提到的，我們對這場戰爭的重視程度，比起東亞其他的國家，身在台灣的人，對二次大戰的認識、重視還有對他的歷史意義的理解其實非常地有限，為什麼？從這個角度來出發，回應一下謝老師主辦這個論壇的用意之一。我自己的理解是，我們重新思考歷史跟人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讀歷史、學歷史，希望從今天的分享當中可以更認真思考人的價值是什麼。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我想跟大家強調的是，太平洋戰爭之前其實就已經開始有被日本軍政府動員上戰場的。台南州是最早開始被動員的，大家有聽過安平軍伏的故事就會知道，在 1938 年就開始已經有台灣人投入戰爭。這就會讓人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台灣人真正參與世界二次大戰其實主要是在海外戰場，台灣本島或台灣本土其實真的受到戰爭、戰火的影響，是一直到空襲，1945 年之後比較有大規模的影響。也因為這樣我想先跟大家指出一個重要的點就是，我們在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其實要先想到，海外的戰場才是台灣人在二戰真正受到影響的空間。

大家都聽過台籍日本兵，尤其在座比較年輕的學生們，可能也在教科書聽過台籍日本兵，人數有二十多萬當中，他們去了哪裡？在戰爭當中經歷了什麼？我們的了解非常有限。他們做了什麼工作？為什麼上戰場？他們是兵嗎？事實上，根據日本官方的紀錄，大部分所謂「台籍日本兵」是一個後設的名詞，當時他們就稱為叫做軍人、軍屬或是軍伏。大部分台灣被動員上戰場的二十多萬人當中都是軍屬，軍屬被派往海外的戰場，派到太平洋戰爭中戰火最激烈的太平洋各個島嶼，在這些地方，台灣人的死亡人數最多。紀錄當中三萬多名台灣人戰歿者，其實大部分都是軍屬，是非戰鬥任務，在軍隊當中扮演各種軍援、後勤角色的台灣人，這些人就稱為台灣戰歿者主要人數。我們知道有高砂義勇隊，他們也是軍屬，也有很多擔任翻譯工作或是擔任後勤補給工作，包括我自己研究的台籍戰犯，他們是在戰後被審判的，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海外喪命的。

在台灣境內，空襲當中也有好幾千人喪命，這些人還是稱之為台灣人戰歿者，跟我們現在的社會比較有關係的是，這些人的家人、後代呢？戰爭當中，只有有一位家人上戰場沒有回來，他的家人都成為遺族，不管是父母還是兄弟、子女、妻子，當時大部分上戰場的是男性，所以妻子是非常重要的遺族。從人口比例上來看，台灣在戰爭結束的時候，總體人口是六百萬，這當中有三萬人戰

死，估算一下，這有多少人的家人可能受到影響？一個人有多少家人？上上下下、兄弟姊妹，這個比例在台灣社會來說絕對不少。

可是我們回想一下，在我們過去認識的歷史當中，你有聽過台灣人戰歿者、遺族這個名詞嗎？如果我們今天想要開始研究這些人的話，有什麼方法、途徑可以思考這個問題？我今天提出來的是透過記憶跟追悼來思考這個問題。剛剛汪老師提到的他主編的《戰爭與社會》是非常非常值得一讀的書，當中汪老師就提出來，我們引介西方社會學界的概念，其實提出「戰爭之框」這個概念。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在戰爭的認識當中，會記得什麼？會忘記什麼？誰會被「我們」記得，而這個「我們」其實是由國族決定的「我們」，包括被認為值得追悼的對象。

在台灣 1945 年戰爭結束之後的戰爭之框當中，值得被追悼的人是誰？中華民國來到台灣之後，建立的是以抗戰為主的戰爭之框。什麼叫抗戰？對日抗戰，這當中台灣人是被抗的對象，所以在戰後國族的戰爭之框，影響到我們今天世世代代對戰爭的認識，台灣人就不見了，因為台灣人的戰爭經驗擺不進去這個戰爭之框。雖然到 1990 年代之後主流歷史論述中，慢慢出現台籍日本兵的相關討論。可是到今天為止，中華民國抗戰的國族之框，仍然影響我們對這場戰爭的理解以及我們怎樣思考這場戰爭對我們台灣社會帶來的影響。

我想跟大家引介一個哈佛大學的校長叫做 Drew Gilpin Faust，Faust 是一個歷史學的教授，專門研究的是內戰結束之後，美國社會怎麼進行追悼這個過程，他提出對戰歿者的死亡，其實我們必須要把他放在跟戰爭的生存者這樣的一個關係下來思考，也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戰歿者跟遺族之間的關係。為什麼這個重要？因為每一個社會在經歷過戰亂之後，都需要有一個過程，讓遺族跟自己死亡的親人能夠重新建立關係。因為大部分上戰場去，怎麼死掉、死在什麼地方，其實這些資訊都非常欠缺。美國內戰還有台灣曾經經歷過的二戰海外戰場，大部分戰死者的遺體都沒有回來，也因為這樣，在一個沒有遺體、沒有遺骨的狀況下，沒有辦法進行喪禮。沒有辦法進行喪禮、埋葬與建造墳墓，也無法有一個具體對象可以重新來界定生存者跟戰歿者的關係，也就是沒有辦法進行紀念。

給大家看一個例子，某一位遺族林女士，他的先生在新幾內亞戰死了。戰爭結束後，先生的戰友們帶回來一個盒子說，這是你先生的骨灰，結果打開來看是兩顆石頭，因為戰場上根本沒辦法處理遺體，所以只好用一個替代品來給遺族作為追念的對象，可是這個對象其實是假的對象，所以對林女士來說，他終生能夠紀念的只有先生出征前留下的指甲跟頭髮。我想提出一個觀念，借用 Faust 教授所提出的概念，就是對遺族來說，其實因為剛剛我們所說的這個狀況，他

們一直都有未竟的紀念的渴望。這個紀念的價值在於說他必須要把親人死亡變成一個事實，然後接受親人死亡的這件事，所以這是一個對任何經歷過戰亂的社會來說，都非常重要的心理工程，是一個具體卻又抽象的社會工程。對遺族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想要找到一個物質的證據，把死亡變成可以看得到、摸得到，或是在情感上可以接受死亡這件事情的根據。我想在座各位如果家裡有人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你一定可以體會，喪禮、掃墓為什麼重要，因為對我們來說，這才是一種我們能夠接受親人死亡的一個過程。可是對戰歿者來說，他們往往沒辦法進行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蠻有趣的是，這個是 Faust 教授跟其他學者們，他們觀察美國內戰、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得到的結論是在沒有遺骨葬禮的狀況下，遺族會自己創造一些可見的符號。有葬禮的話，會有喪服跟服喪的這段時間。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話，他們就會去想辦法創造一些「有形的紀念物」，或者是他們會進行一些朝聖的行動、立紀念碑。在台灣的狀況是，戰爭結束之後，中華民國體制下，對台灣戰歿者，其實是完全不聞問的。國家不做只好自己做，台灣的戰歿者遺族怎麼樣進行紀念？舉個例子，在一戰結束之後，英國很多士兵的遺體都沒有回來，而對家人、他們來說最重要的一個物質紀念物，是英國政府會頒給每一位陣亡士兵的紀念章，上面會刻著戰死者的名字，很多遺族就以這個紀念章當作他們紀念的對象，在家做一個小神殿。這個紀念章上面刻了很多偉大的理想等等，右邊是戰死士兵的姓名，這個紀念章看起來很像銅板，也因為這樣被暱稱為叫做「死人的硬幣」。對遺族來說，這樣的紀念物跟出征之前留下的指甲頭髮不一樣，因為這個紀念物是有名字的，名字是代表具體的這個人曾經存在過的證據，這個證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確保他們死去的親人會持續被記得。

可是在台灣的狀況，沒有這種東西，台灣的遺族用什麼？給大家看一個照片，這個是我的一位研究生他在某一位遺族家裏拍到的照片，這是祖宗牌位，台灣家庭很普遍會看到的。牌位下面，在香爐跟祖宗牌位中間，多了一塊白色的一個框起來的紙，上面寫「海軍某某人，在昭和幾年幾年當神社本殿……」昭和五十二年，靖國神社發給台灣人遺族的一個合祀通知書，是 1977 年所發，這時才告訴台灣遺族說，我們 1960 年已經把你的親人跟我們合在一起。我想跟大家談這個的意義是什麼，靖國神社在媒體上的討論你會聽到有爭議的故事，可是很多台灣遺族都把合祀通知書當作祖宗牌位一起來祭拜，因為這是少數，甚至唯一他們可以看得到有自己死去家人的姓名的，一個物質性證據，就像英國紀念章一樣的意義。

再給大家看一個例子，朝聖，到戰場上去朝聖，因為想要看到自己親人死在什麼地方，一戰中很多這種例子，英國人去法國等等，朝聖的意義是讓死亡這件

事能夠變得可以看得到。那台灣人遺族到海外去嗎？事實上台灣人遺族連自己親人死在哪裡不知道，所以他們去靖國神社朝聖。注意那個時間點，1979年，戰爭已經結束三十五年了，台灣人遺族才組織第一次去靖國神社朝聖的團體，為什麼？因為在1977年之前，靖國神社對台灣遺族來說其實本來完全沒有意義，一直到他們接到這一張物質性的證據，他們才認為自己的親人戰歿者跟靖國神社有一個連結，所以他們才會把靖國神社當成一個朝聖的對象。這個跟國族認同沒有關係，純粹就是為了追悼的需要才尋找的地方。

紀念的意義對遺族來說，就是跟遺忘的對抗，他不希望自己的親人戰歿者被忘記，其實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他不希望自己的親人變成沒有歷史的人。但是國家不做，那自己做。大家可以去翻閱一本書《從都蘭到新幾內亞》，作者蔡政良先生現在目前是台東大學的教授。他的祖父參加過高砂義勇隊，曾經到新幾內亞去參與戰爭，他祖父沒有戰死，可是許多戰友都戰死。所以他在2013年的時候，去新幾內亞進行一個為祖父戰友們慰靈招撫的工作，他把這稱之為「高砂的翅膀」，他在這裏立一個木雕的紀念碑，希望這些戰死的原住民靈魂能夠透過這個儀式歸土還鄉。他們回來之後，從戰場上帶回一些泥土跟石頭回來，就擺在部落裡面。沒想到幾天之後，就有一位部落當中的vuvu，vuvu是祖母的意思，帶著一張穿著軍服的少女的照片，來到這個泥土石頭前面開始大哭。（按：vuvu說：「哥哥，當年你出發去打仗的時候，我跟媽媽一起去送行，你出發前跟我說，等我回來，我會幫你買筆記本和鉛筆。可是，我已經等了70年了...」）vuvu的哥哥在1943年參加高砂義勇隊，到新幾內亞去，再也沒有回來，對這一位遺族來說，經歷了七十多年，要一直到有戰場上回來的石頭跟泥土，能夠有物質性的證據接觸到、看到，他才得到一個跟自己死去的親人之間能夠重新界定關係的機會。今天就幾個主題來跟大家分享，在台灣歷史上出現過我也認為我們還應該要記得，不只是死去的人，還有他們的遺族，謝謝大家。

汪宏倫：非常感謝藍適齊教授非常精彩的分享，他的材料還蠻多的，但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很完整跟大家做一些陳述，Q&A的時候大家可以多提一些問題，讓他有更多時間跟空間可以去發揮他準備的材料。接下來第二位的發表人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他是中研院台史所檔案館的館員，陳柏棕先生，他要發表的題目是「臺灣二戰遺族與戰歿者紀念場域—以新竹北埔濟化宮為例」，我們就歡迎他。

陳柏棕：大家好，我今天要報告的題目是「臺灣二戰遺族與戰歿者紀念場域—以新竹北埔濟化宮為例」。進行這個調查研究的時候，汪老師跟藍老師的研究讓我受益非常多。我今天要報告的主題是，討論濟化宮如何成為一部分遺族的追悼場域，如何和遺族產生關係，我會舉出幾個具體家族遺族的案例來觀察。

在這裡我要先舉一個林金隆遺族的案例，來說明一個遺族家族在戰後的處境。林金隆他是台中人，公學校畢業後他就到獅王圖案去繪製各種廣告招牌，1942年6月的時候他就去應募英米俘虜監視員，8月的時候他被派去菲律賓中部俘虜收容所。這張照片是林金隆他1938年9月的時候拍攝的照片，聽他妹妹說林金隆字寫得非常好、很會畫人物像，這面招牌有一些可能也就是林金隆的工作成果。在戰後他被指控1944年的時候殺害了一個陸軍軍官的俘虜，1946年7月就被處死，當時只有22歲。他只有頭髮跟指甲被戰友帶回來給他家人，告知林金隆死亡的消息，不過林金隆並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林金隆的弟弟林德隆他其實也在戰爭中死亡了，在1945年6月就在海南島戰死了，因為兩個小孩都在戰爭死去，他們家又在戰後公地放領的政策而失去田產，這雙重打擊影響非常大。他的媽媽更是受不了兩個小孩都這樣戰死了，無法承受喪子之痛很快地就亡故了。林爸爸為了傳宗接代的任務又去續絃，在五十歲好不容易又生下一個小孩。這張是我覺得蠻難得的是，林金隆的弟弟林德隆他戰死的時候，官方為他舉辦的一些祭儀，是很少見的台灣戰歿者追悼的場面跟紀錄圖像。林金隆因為執行任務、射殺逃亡的戰俘而被判死，戰爭審判中日本的軍官有沒有卸責的問題？這個判決對林金隆真的公平嗎？這場戰爭讓林家家破人亡，家庭也因此重整，對於戰歿者而言，他們家屬不太願意提起這件事，這是戰爭造成家庭破碎的案例。

在日本，二戰遺族很快就進行集結了。他們1946年6月就開始進行組織，到1953年3月，甚至還成立了日本的遺族會，這個遺族會就是推動很多援助遺族的相關立法，也重視紀念戰死者親屬的聲音，像是促成政府舉辦「全國戰歿者追悼式」這些活動等等。反觀台灣的遺族，因為政治體制的問題，沒辦法出現像日本遺族會這樣強而有力的組織，民間無法團結力量來爭取相關權利，像剛才藍老師所說的，台籍的戰死者也不夠具備接受中華民國表彰的資格，所以遺族他們並沒有一個公開追悼他們先人的場域，沒有紀念的契機。當這些戰死者他的父母、他的手足、子女凋零之後，他們擁有、甚至是付出生命的特殊時代經驗，可能就被後人淡忘掉。

那濟化宮其實就是一個戰歿者的紀念場域。濟化宮很特別，發源於在一個礦場裡面，原本是工寮裡面一個小神壇，後來在礦主的支持之下，在1961年的時候他正式建廟，之後越來越擴大規模，可以容納十萬座靈位寶塔。這座寶塔就是未來他們安放台籍日本兵靈位的空間，其實濟化宮還透過很多公益活動來提升知名度，接下來他就籌劃了一個跨國的行動，在1979年向日本交涉，準備將合祀在日本靖國神社的那些亡靈，把祂迎回來台灣奉祀。

濟化宮之所以會想到這個點有幾個來源，第一個就是他們的標準說法，廟內神佛指示要把台灣的亡靈從日本解救回來台灣奉祀，這是他們對外最常見的說法。另外一個就是礦主，神壇的負責人，當時有很多礦工跟他說，很多二戰的家人去打仗之後就沒有回來的。他們之後還要去靖國神社去參拜，很不方便，也要花很多的旅費，這也是濟化宮他們到靖國神社去迎靈的發端。另外還有一說是，其實那個董事長參加過討債團的活動，他去過靖國神社參拜，並經由這個參拜經驗，就發現其實日本兵有被奉祀在靖國神社裡面，於是他要把這些亡靈迎回來濟化宮來做參拜。

因為有這層的關係，有跟討債團的交流，他們就透過討債團來跟靖國會取得聯繫。靖國會是什麼？靖國會其實是一個捍衛靖國神社還有維護國體的一個民間團體，他不是靖國神社編制內的體制。經過一些護法之後，就由濟化宮組成迎靈參拜團，還搭專機去靖國神社招魂，宣稱要把三萬名的日本兵都迎回來台灣。他們在這個協商過程中還做了些前置作業，這個是他們要去招靈的時候，所做的一個軍靈總牌位。他們還特別做了三萬座的靈位牌，動員北埔國小的老師、廟方人員一起來寫，用黑色油性筆在塑膠製成的牌位上面寫故某某的靈璽。迎靈回來之後，軍靈總牌位就放在寶塔的四樓，其他三萬多座的靈位牌都放在三樓，裡面就用混凝土做的棚架，按照日治時期的五州三廳行政區劃，分成三十排，每一排有十一段來安放這些靈位牌。1982年10月25日的時候，對外正式宣告說他們把台籍日本兵都迎回來安奉了。迎靈回臺之後有大批的遺族都來弔念他們的親人，還有查閱名簿。濟化宮宣稱靖國神社有給他們「祭神簿」，所以不少遺族在參拜的過程中就踴躍地捐款，在當年的寺廟收益調查中，他們的收益是全國名列前茅，是博德美名之外很實質上的效應。

這時候在濟化宮迎靈的過程當中，台灣民間的求償運動也正在進行，有非常多的討債團，就想要跟日本討這些存款，軍事、郵便儲金這一類的。當時他們濟化宮就被規模最大的討債團指控他們說，他們宣稱拿回來的祭神簿其實是從討債團抄來的，靖國神社也出面來表示說濟化宮確實有跟他們提出要求祭神簿還有要分靈這件事，不過靖國神社並沒有分靈的前例，也沒有實際的靈位牌，祭祀方式是合祀，信仰體系並沒有存在著分靈概念，所以他們拒絕濟化宮的請求。面對這樣的聲明，濟化宮他們就開始改口，就說他們其實是透過靖國會來迎靈，名冊也是由他們提供的，這樣前後不一的說法開始引來社會上的一些批評，也開始質疑他們背後的動機。濟化宮也在董事長驟逝後爆發出財務危機，因為1970年他們為了迎靈活動就動用了很多資源，留下了很龐大的債務，還沒辦法償還就被法院接管，一直到1996年才還清了這些債務。

不過1980年初這些行動雖然招來質疑跟批評，可是經歷了80年代末期，也就是台灣遺族開始對日本政府進行求償，申請弔慰金的時候，濟化宮協助了部分

的遺族取得他們親屬的資料，所以重新再獲得好評，雖然有過這些瑕疵的做法、說法，不過好像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此後濟化宮更成為一個紀念的場域，有些遺族開始定期來參與他們的祭典，濟化宮成為他們祭祀還有悼念親人的固定地點，只要遺族前來參拜，他們報上親屬的名字，廟方就可以從名冊裡面找到他們安奉的位子，然後再從寶塔裡面去找到他們親屬的靈位牌，像張金章跟陳世鐘遺族就是在這裡找到他們親人的下落。

這是張金章遺族的案例，張金章他是臺南人，他是住在關子嶺那邊。他十六歲父親就往生了。從學校畢業之後，他就進到台灣製糖會去工作，後來在社長的鼓勵之下去應募補充軍。張金章受訓非常優秀，所以他就被軍方選派到日本去培訓，不過他的船被擊沉了，張金章就連同 211 名台灣水兵不幸喪生。當時他在軍隊留下的頭髮跟指甲送回張家，但因為沒有遺骨，所以家人就為他設置了衣冠塚，然後用頭髮跟指甲取代遺骨。遺族他們擔心像張金章這種沒有結婚就亡死的人會在陰間受苦，所以就由張金章的弟弟過繼子嗣來傳承香火。遺族張金章的母親因為他的死亡，打擊非常大，終其一生沒有釋懷過這件事，所以這輩子不斷地對張金章的弟妹跟他的孫子兒孫講述他的過往，也傳承這名早逝家族成員曾經存在過的記憶。遺族他們完全沒有聽說過濟化宮去靖國神社移靈這件事，所以也就不知道說那裡有供奉張金章的牌位。今年三月，張金章的遺族到了濟化宮，一樣向廟方提供了相關資訊之後，很快就在名冊找到他的資料還有靈位牌，隨後他們就進行了參拜。遺族表示說，他們對濟化宮長年以來無償安奉他的靈位牌感到非常感謝，他也很快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的家族成員，所以今年十月之後，他們又一起到濟化宮去參加祭典。

那另外一個是陳世鐘遺族，他是另外一個在濟化宮完成尋親的例子。陳世鐘是大溪人，他沒有完成公學校的學業，就在家裡協助農務，他跟他的大哥一直處不好，讓他爸爸很為難，所以他就三次到海外去志願。他去哪裡從軍遺族其實不是那麼清楚，但可以知道的是他最後一次從軍的時候，他已經結婚了，還有兩個小女兒，不過這次他出征之後就沒有再回來了。從祭神簿的資料裡面是知道說，他在 1945 年 1 月 1 號的時候在菲律賓馬尼拉戰死，家人有遺留他的舊衣服，那時候舊衣服的領口有上海和豐內衣公司的標籤，或許有到過上海經驗。後來我們在台灣農業義勇團誌發現陳世鐘的資料，他曾到上海的軍農場去協助生產。陳世鐘死後，他的遺孀李甘失去了經濟資助，他和他兩個小女兒就委身在大家族裡面生活，因為其實陳家還蠻大的。據他女兒陳冬表示說，因為沒有死亡細節跟遺骨，所以他的媽媽認為他爸一定會再回來，李甘不再改嫁了，他一直到 2015 年的時候以九十九歲高齡死亡，守寡非常久。也因為他沒有男嗣，由他大哥的第三個兒子來過嗣為他的子嗣，傳承他的香火，以繼承家產。

陳世鐘的死亡變成他們家裡的禁忌，他們家人不會公開談論他這個人，陳世鐘他的次女陳冬出生三個月後，爸爸就到戰地然後從此沒有再回來，他只能透過其他家族成員口中去了解他的父親。他甚至透過靈媒卜卦的這些民間信仰，來取得他爸爸的消息，跟爸爸產生連結。她出嫁之後也沒辦法祭祀他父親，因為忙於家庭瑣事，也不知道濟化宮有做過迎靈這件事。當她知道濟化宮有奉祀他爸爸牌位，很快就到濟化宮去參拜了，也一樣跟張金章家族肯定濟化宮的做法。她在參拜的時候也說只要身體健康，這裡舉辦的法會她都一定會到。

最後做一個簡單結論，遺族面對親人的喪失，普遍需要一個心靈補償的需求，濟化宮對於遺族的一個重要意義是，提供很具體的撫慰管道。濟化宮除了有軍魂的總牌位之外，還有三萬餘名台籍日本兵靈位牌，把靖國神社的祭神的合祀制轉化成我們台灣人信仰的方式，其實也提供了遺族一個公開憑悼他們親人的空間、可以追悼的場域。內容包含了空間本身，他在空間就是濟化宮，還有供奉亡靈的寶塔，物件就是可以查閱他們親屬的名簿就是祭神簿還有靈位牌。從張金章還有陳世鐘遺族尋親的例子可以知道，他們就是在這裡和戰場上死去的親人建立起新的連結，然後也滿足他們一部分的心理需求。以上是我今天的報告，謝謝。

汪宏倫：非常感謝我們兩位發表人非常精彩的報告，接下來我想我們就開放給大家來提問，但在進入提問討論之前，我想我先簡單說一下，我在聽完兩位發表人的報告之後我自己一些心得跟感想。

回到今天這個主題：沒有歷史的人，從台籍日本兵或者戰歿者跟遺族這件事情上面，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看到，所謂大寫的歷史跟小寫的歷史兩者之間張力跟衝突。大寫的歷史指的是，以國族為單位或框架去寫的這個歷史，這個歷史是非常光榮的敘事。即使不是光榮敘事，是恥辱悲傷的敘事，他還是得讓國族的地位提升，要帶有一些歷史敘事的意義。這個小寫的歷史是個人、家族的歷史，這些歷史可能我們並無法完全符合到國族歷史當中。在前一場紅葉少棒的這個故事裡面，我們所看到的是紅葉作為台灣人的共同記憶沒有被遺忘，只是他不斷被收編到宏偉的台灣國族敘事，或者是當年的中華民族那個。但我們真正去看這些家族跟個人，他們每一個人另外一面的歷史無法貼合到宏偉的歷史裡面去，在這個意義下，這是「沒有歷史的人」。

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台籍日本兵的這些人或者這些戰歿者，他們本來要去被當成像烈士來表揚，因為他們是為了國族、天皇，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到最後他們什麼都不是。跟前面那個紅葉少棒故事相比，他們甚至連國族的敘事都沒辦法被收編進去，不但被先前的祖國所遺忘拋棄，也不被新的祖國所接受。各位如果稍微對台籍日本兵的故事稍微有關注的話，在陳柏棕先生的報告裡面

談到討債團，指的是日本政府在戰後對原日本兵是有些補償的，可是對於台灣、朝鮮這些前殖民地來的，因為不是日本國民了，所以不補償。這很明顯可以看出來，無論是生存者或是戰歿者，都是被先前的祖國所拋棄，被新的祖國排斥。這個處境當中我們真的可以看出，台灣作為一個集體在整個東亞的近現代史中一個非常特殊的地位。簡單地把這個大的一個背景跟大家做個提要，接下來的時間就請大家對兩位發表人來進行提問。

藍適齊：想問一下在座各位，有沒有人家裡有台籍日本兵的故事？有曾經聽過自己的家人去過南洋，有回來嗎？

觀眾：有。

藍適齊：我這樣問是因為個人研究興趣，大概從十年前在研究台籍日本兵的歷史記憶，我就發現每次有台灣的聽眾在場的機會大概都沒有相關故事。用這個來跟大家說明，這其實是台灣社會當中應該非常重要的議題，可是過去一直被忽略。

汪宏倫：在場的聽眾同學朋友們，有沒有針對剛剛兩位的報告要提出問題的？

謝仕淵：其實這個問題就剛剛適齊所說的還蠻普遍的，因為數量真的也不少，隔了七十年，你今天舉的這兩個例子是怎麼找到？是你帶他們去做這件事？然後你怎麼跟他們溝通？就你所知，訪問這麼多台籍日本兵，倘若我們今天要做這件事情，譬如說，不直接跟濟化宮合作，有什麼有效的途徑可以讓這件事情開展？

陳柏棕：兩個例子一個跟我有密切關係，一個其實是我姑婆，就是那個陳世鐘遺族，所以我去找他蠻多次的，不斷挖他的傷疤，不過我姑婆確實非常想念他的父親，所以他跟我講非常多他的故事。另外那個張金章他也是個偶然，就是我前陣子有寫一本談護國丸的書，後來我就接到一通電話，就是張金章的遺族他看到這本書之後想要來跟我聯繫，也是一個蠻偶然的巧合。我那時正在濟化宮調查，也去了蠻多次的，就有跟他們提到這個消息，他們都非常有意願去，甚至跟他講的隔天就來問我，有沒有空可以帶他們去。所以他們其實是很想要跟他的家屬見面，就是去看他的靈位牌，看了之後情緒也是蠻激動的，就是彷彿他爸爸、伯父就在這裡，對他們來講，其實影響、衝擊蠻大的。

下一個問題我覺得就比較困難一些，就是我們怎麼去發現這些遺族。遺族真的非常多，三萬多戰歿者，有這麼多的家庭，台灣應該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只是說怎麼去突破，真的很難。我目前想到一個方式，去蹲點，但那要花很多時

間，要有人類學家的一些做法，其實濟化宮他們是有資料的，他們有針對遺族做遺族的名冊，要怎麼樣跟濟化宮去取得？我剛才有報告他們經歷了一些尷尬的過去，所以現在非常低調，不太願意去講過往這件事，所以要怎麼去談這些學術研究的事情，可能還要再努力看看，這些是目前的想法謝謝。

汪宏倫：在場的朋友們還有沒有想要提出問題的，或者是剛剛家裡有台籍日本兵的親人或者家屬的，針對剛才的報告，有沒有什麼疑問？

觀眾：我第一次聽到濟化宮，真的是非常驚奇。我稍微講一下，我所知道自己家裡的台籍日本兵的故事是我外公的六弟，他有回來，我所知道的是他有兩次都是無疾而終的婚姻，第一次出征前家裡安排的婚姻，回來之後也許因為個人記憶或怎樣就無法維持，他又娶了另外一位女性，是一位天主教教徒，可是這個婚姻也沒有維持下去，婚姻的過程中他就生了兩個孩子，一個姊姊跟一個弟弟，離婚之後就各帶一個走，媽媽帶女兒走，弟弟留在我家族裡面，他是跟我媽媽們同輩一起長大，算是我的表舅。

後來，也是非常神奇的故事，有一天他分散很多年的姊姊突然回來找到他，他的姊姊設法從鄉公所找到他。因為他媽媽每天祈禱還會講他弟弟的名字，所以他才知道。我只知道這個，所謂我叫六叔公非常片段的人生，他回來之後，人生經歷裡面，其實有這樣破碎的片段，他在外面經歷過什麼，是沒有生命、沒有歷史的這樣。

汪宏倫：還有沒有朋友針對剛剛的兩個報告有進一步的問題？因為這場的題目比較沈重，可能大家比較陌生一點。我再一次拋磚引玉，提出兩個小的觀察。其實兩位發表都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叫做靖國神社，它是充滿政治爭議的地方，甚至有點污名化的地方。無論在日本、中國、台灣，靖國神社被認為是一個日本軍國主義、右翼團體的聚集所在地，我自己因為研究的關係，也是做到跟東亞的戰爭記憶相關的研究，靖國神社我去了很多次，特別是 8 月 15 日他們的終戰紀念日。你會看到 8 月 15 日那些靖國神社的參拜者絡繹不絕，外面很多團體真的是日本的右翼團體。但另外一方面，那些絡繹不絕去參拜靖國神社的，真的不是什麼右翼團體，是家裡的遺族在裡面，反而是從外界用那種國族框架去看他們的人認為他們是右翼團體去參拜，可是這裡面很多人很低調的，他們也就是戰歿族的遺族。

今天台灣也有很多人，要求分祀也好、分靈，或者是剛剛藍適齊教授說的去朝聖，因為這是他唯一跟親人聯繫建立的地方，台灣內部可能就說這是日本皇民，有時候太過用一個大的國族框架去壓在這些人上面。可是對他們來講，可能就是單純地，針對家族或者是我的親人，找一個可以紀念、憑弔他們的地

方，如此而已，反而是我們的社會常常用大的框架或用特定的角度去看待這件事。那從這裡我要延伸的是說，其實剛剛在藍適齊教授的報告裡面談到跟國外的一些對照，比如說跟英國他們的一戰的遺族，也許可以再做參照的地方是，比如說德國的納粹的軍隊、納粹的士兵的後代，現在你一提到納粹，就是非常嚴重的反人道的一個罪行。這些人從現在來看是錯誤的，但是我們該怎麼樣去紀念他們，這些人就應該被歷史消除、被遺忘嗎？這其實很微妙地牽涉到，可能也跟剛剛的紅葉有關係，在歷史上好像都有一個瞬間這些人做了不太對的事情，他們歷史就不能被提，像剛剛陳柏棕的報告也有提到，即使是家屬都覺得好像講不太出口，像這樣的歷史我們怎麼樣去紀錄怎麼樣還原，像這樣的人該怎麼樣被紀念？

另外一個是針對陳柏棕先生的報告，因為剛剛提到新竹的這個濟化宮。濟化宮，我不曉得它宗教的背景是怎麼樣，因為其實在日本的靖國神社很明顯有一個神道的傳統在那個地方，他們會宣稱人死後其實是沒有善惡，或者是說你生前所做過的一切錯事壞事都已經被放下了，人死後到一個神的國度裡面已經沒有善惡之分，所以他們不認為我去紀念一個日本士兵是否有大的罪過或者是錯誤。宗教或者教義在台灣的遺族紀念裡面扮演什麼角色？簡單地先提到這邊，是不是請兩位能夠簡短回應一下。

藍適齊：其實我自己的研究經驗遇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也許不是直接回答汪老師的問題，我之前在做台籍戰犯研究出了幾篇論文之後，突然有一天接到一個 email，他告訴我他是某位台籍戰犯的家屬。當然一開始還非常客氣，最後的問題其實是完全反過來，他說有沒有辦法申請把他自己家人台籍戰犯的資料不公開。我覺得跟你剛才提到的納粹狀況非常像，他們在後來歷史建構的論述當中，被看成「歷史的罪人」，這跟我們今天的主題非常有關係。「歷史的罪人」就應該成為沒有歷史的人嗎？你剛剛提到一個宗教的問題，我覺得這是相關，就是我們怎麼紀念他們？作為一個社會、人類，或者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怎麼去研究、紀念，怎麼樣去探討曾經被作為罪人的人？我自己的看法是，其實是我們透過他們的故事、經歷，讓我們看到歷史如何影響個人的生命，他沒有對錯，台籍戰犯的經歷是非常特別的經歷，因為他們是少數台灣人在國際法庭上面被追訴責任的一群人，而他們之所以被追訴，背後牽扯到不同帝國之間競爭的力量，還有帝國瓦解之後想辦法要去挽救自己國際地位的種種戰後的變遷，聚焦在這一個人身上。

我後來跟他解釋說，他的家人的歷史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發。在座可能有些人會想：我又不是遺族我幹嘛關心這問題？戰爭七十幾年過去了，我幹嘛關心這個問題？可是我的出發點是從歷史當中，可以來幫助我們了解我們當代正在建立的台灣、東亞、世界的環境，也因為這樣，最後還是認為這些人的歷史非

常值得研究。他對我答案非常失望，因為他從我這邊得知原來台籍戰犯的資料在好幾個不同的檔案館，都是完全公開的資料。他非常害怕，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親人被認為是罪人的歷史，這是一個個人和解跟社會和解必經的過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陳柏棕：關於濟化宮它是一個怎麼樣的宗教背景，它是在拜關聖帝君的一間廟，之所以會有這個動機，就我的側面了解，是為了想要帶來更多知名度，藉由這個行動然後來落實完成。這對於遺族而言這還蠻重要的，因為台灣民間信仰是，人死後沒多久就會合爐，合爐之後沒有獨立的牌位，這些彼此沒有一個獨立的牌位可以來紀念他們，濟化宮這邊就有一個很現成、有具名的靈位牌，對遺族而言，那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所在。至於怎麼看待他們家屬，我覺得不會有一個善惡的存在，就是一個家人所在的地方。我可以再補充一個例子，像剛剛提到林金隆的例子，他也是戰犯，唯一一個在菲律賓處死的台灣人。他妹妹就說，其實他妹妹也從他先生，也是他哥哥的戰友，就有側面瞭解，他有一套自己的解釋跟理解他哥哥這個行為的背後的想法，他覺得他哥哥是代替別人而死，因為其實逃亡的軍官不在他的管轄範圍，可是他就要逃跑了，如果不去阻止他的話一定會有人遭殃。所以他哥哥就對那個軍官開槍，後來的結果就是他哥哥必須要去承擔這件事情，所以他哥哥是為人而死。剛剛跟各位報告過，後來他們家重組變調就不再願意去談這個事情，可能是他的戰友的女兒帶我跟另一位老師一起去訪問，老太太才願意再說一些事，還有就是把這些資料展示。可以看到林金隆的照片很難得，了解一些他的過往，不然這件事情其實就會塵封然後不再出現，林金隆也慢慢被遺忘掉，這是我一點點補充。

汪宏倫：這場可能稍微沈重一點，我希望我們從這個台籍的，無論是日本兵戰歿者、遺族的這些處境，我們可以看到台灣處境的特殊，從這裡面看到很多悲劇性跟荒謬，但是我希望可以從這些人身上能夠去提煉出或找出來有一些更為正面的力量或想法，比如說，讓我們理解到和平的重要、讓我們理解到和解的重要，如果讓我們從這些人的悲劇性的過往，或者是從這些處境的荒謬性，從這邊為我們未來有更正面、更光明的想法的話，我們等一下吃午飯可能會比較快樂一點。今天非常感謝大家參與，也感謝兩位發表人非常精彩的報告。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